

中国民族史学会 编 ●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民族关系史论集

ZHONGGUOMINZUGUONXISHILUNJI



前 言

中国民族史学会于1985年10月在厦门召开了首届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来自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包括汉、蒙古、满、藏、回、壮、彝、土家、苗、白、侗佬等11个民族成份的代表124人。这次会议的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宋辽金时期和清代的民族关系。大家在讨论中，遵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交流学术思想，互相学习、切磋，促进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

建国以来，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一向为史学界所重视。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进入80年代以来，都曾掀起讨论热潮。通过讨论，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这次会议在此基础上专门讨论了三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与会者重点探讨了十六国时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认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这一时期政权林立，战乱相继。这种民族间的混战，既不能等同于三国鼎立式的割据战争，更不能等同于外国的侵略战争，而是中国各民族统治阶级在国家处于分裂时期争夺中原政权和其他地区统治权的斗争，因而对许多涉及民族间斗争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例如，这个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大多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不管是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都与汉族士族地主阶级相结合，吸收士族代表

中国民族关系史论集

中国民族史学会 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2 字数: 292,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460

ISBN 7—225—00193—0/K, 20 定 价: 2.90元

参加政权。另一个特点是，各族上层人物，尽管保持其部落与政治势力，但他们在势力较弱时，也接受较强大政权的封爵与官号，在政治上有各种形式的联系。第二，这一时期共有三次规模较大的民族大迁徙，造成民族分布格局的大改变。这种状况，客观上又加速了各民族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以至逐渐接近、互相同化，而最终大量融合为汉人。汉族吸收了许多新的成份和文化因素而得到发展壮大。第三，由于民族大迁徙，长江流域和边疆各族地区得到开发，各民族经济文化交融发展，成为隋唐文化兴盛的渊源。

会上还探讨了北方民族南下的原因，有几种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认为北方草原地理条件不如中原优越，北方民族南下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有的同志则认为北部草原有些地区地理条件很好，如吐谷浑西迁就不是因为地理条件。有的同志认为与丝绸之路在东汉末年中断有关，因游牧民族要进行交换，于是举族南迁与西迁。有的同志认为在西域交通中断的情况下，东汉及北朝与北方民族的互市仍然保持。还有的同志认为与中原王朝腐朽势衰有关，游牧民族骑兵占有军事上的优势，所以趁机南下。有的同志认为这种观点也有片面性。因为少数民族内迁与汉族杂处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有许多情况是“内属”或是被强制的。

二、宋辽金时期的民族关系。代表们集中讨论了如下两个问题：

一是宋辽金夏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问题。辽、金是以我国北方民族契丹、女真为主建立的两个王朝，有的同志认为它们与北宋、南宋对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朝。关于西夏，有的同志认为自拓跋思恭夏国公政权开始至西夏灭亡，存在时间

比两宋或辽金相加存在的时间相当或稍长，其文物典章之盛，也自成一代制度。因此，应当把西夏与宋辽金平列为一个王朝。有的同志则认为，西夏自元昊以下各帝，时而向宋，时而向辽、金称臣，或同时向宋、辽称臣，其经济文化及制度也不足与宋辽金相并列，视为地区王朝更为妥当。

二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是否形成发展中心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否定大汉族主义正统观，视宋辽金对峙为第二次南北朝，并不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心在两宋。实际上北宋对辽、西夏都纳岁币，处于守势；而南宋则向金称臣，处于屈从地位。但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经济制度、文化的发展中心仍在两宋。宋在军事上不能取胜，而文物制度对辽金西夏的影响却很大。辽代政治制度先仿于唐后学于宋，同时吸收突厥——回纥的影响与其固有的制度相结合形成南北面制度；金则继承辽朝而较多学习宋朝立制。经济交流上，是北朝依赖南朝；文化上虽互相影响，但宋影响于辽金较辽金影响于宋远为明显。有的同志则认为，这一时期宋辽金夏历史地位表明当时没有形成中心，特别是南宋处于屈从地位，更不是中心。

三、清代的民族关系。大家还集中讨论了清代民族政策的评价问题。有的同志从总体上做了考察，认为清代民族政策比较成功，其实施结果有利于清王朝的统治，客观上也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肯定其成功，并不等于否定这种政策的民族压迫性质，要作阶级的、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不应把政策的制订者、执行者的主观动机作为评价其历史作用的依据。有的同志认为清代民族政策内容丰富，对汉族、蒙族、藏族和南方民族的政策均不相同。因此，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

则。同时在执行过程中，也可分为若干阶段，每个阶段各具有特色。改土归流是清代处理南方民族问题的一项重要政策，对这一政策的评价，意见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涉及到清王朝对苗族的政策。

与会者向大会共提交80篇论文，我们从中选出22篇，汇编成这本论文集。凡已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概未收入。论文按这次会议讨论的三个历史时期先后排列，同一时期内则按类别列目。

本书由《中国民族关系史论集》编辑组负责选编和审定。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87年1月

目 录

前言	(1)
论十六国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	白翠琴 (1)
从十六国时期鲜卑氏胡在甘青地区的活动谈 民族关系	半一之 (25)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部的民族关系及其 经验教训	陈可畏 (39)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地区的民族及其相互关 系	郭平梁 (68)
南朝的民族融合	李 幹 周社征 (92)
试论广东俚汉民族关系	练铭志 (118)
试论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在辽朝的作用	邢蒂蒂 (141)
辽宋战争中的辽将耶律休哥	匡裕彻 (156)
9 世纪末至12世纪初鞑靼与契丹的关系	余大钧 (171)
甘州回鹘与北宋	范玉梅 (182)
河湟吐番与辽朝的关系述略	祝启源 (194)
论金朝南迁后的宋、蒙、金关系	任崇岳 (206)
略论金朝与漠北诸部的关系	罗贤佑 (225)
西夏时期党项族与汉族关系试析	陈炳应 (243)
试论清王朝的民族政策	刘先照 周朱流 (268)
从八旗水师的兴衰看清代民族关系的一个侧	

面	傅克东 (287)
论清前期满、汉朝臣的关系	滕绍箴 (303)
清代北方各族与汉族的文化科技交流	卢明辉 (322)
清中叶哈萨克族与内地各族人民贸易关系浅	
探	蔡家艺 (347)
台湾建省初期刘铭传与高山族	陈国强 (367)
论郑成功的抗清斗争	蒋炳钊 (387)
清代汉族与高山族的贸易关系	郭志超 (400)

论十六国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

白 翠 琴

东晋与十六国对峙及北方十六国纷争，实际上是形成南北朝的前奏。关于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曾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益探讨，取得可喜进展。十六国时期的民族关系，虽已展开初步研究，但在许多著作中，未能摆脱“五胡乱华”的传统观念。现笔者仅就十六国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问题，一抒管见。

一

十六国时期民族关系特点的产生，是与当时具体历史情况分不开的。因此，在分析这个时期民族关系特点以前，必须对魏晋以来历史特点有个概括的认识。

汉魏以来，北方周边各族纷纷内迁。这一方面是由于豪强混战，使原来人口集中的关中和黄河中下游地区遭到严重破坏，中原人口锐减，汉族地主阶级为了补充兵源和劳力的需要，用招募、纳降、强制迁徙等手段，使北方诸族大量内迁。另一方面，也由于北方诸族之间兴衰变化，以及长期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所形成的内聚力，使其不断向内地流动。因此，从东汉至西晋，不仅早已内迁的氐、羌、匈奴等族更向中原发

达地区深入，即使原居住东北的乌桓及东部鲜卑也陆续入塞。而汉族人民由于逃避战乱及沉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再加统治阶级开疆辟土的需要，也大量流入凉州和东北，与当地氐、羌、鲜卑等族杂居。幽、并、雍、梁、秦、凉等州出现各族错居杂处的现象，造成“西北诸郡，皆为戎居”^①，“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狄戎居半”^②的局面。

内迁各族受到西晋统治阶级的奴役和压迫，不断起兵反抗。到西晋政权崩溃前夕，内迁各族统治者纷纷摆脱西晋的羁绊，形成独立势力。除居住在辽东的鲜卑慕容氏打着拥晋旗号扩张势力外，大多暂时汇集在匈奴刘氏周围。西晋灭亡后，北方及西南等地诸族统治者均欲建立自己的政权，彼此展开长期的争夺战争，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民族间政治、军事方面多边角逐，出现旧史所称“五胡十六国”^③的局面，开创了北方民族南下入主中原的先例。由于这些政权掌握在不同民族统治者的手中，因此，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兴衰嬗递，实质上是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反映。

十六国时期，北方局势纷扰动荡，各少数民族统治者陆续在广大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成为统治民族，出现了较为落后的民族统治较为先进地区、许多民族政权鼎立并峙的局面。同时，原居于统治地位的中原地区汉族，变成被统治民族，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①《资治通鉴》卷81，晋武帝太康元年。

②《晋书》卷56，《江统传》。

③十六国为成汉、二赵（前、后）、三秦（前、后、西）、四燕（前、后、南、北）、五凉（前、后、南、北、西）及夏，此外，还有冉魏、翟魏、西燕和北魏前身代国等。其中前凉、北燕、西凉为汉人所建，前燕、西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为鲜卑所建，成汉为巴氏所建，前秦、后凉为氐族所建，前赵、夏为匈奴所建，后赵为羯所建，北凉为卢水胡所建。

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对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这个时期的民族关系呈现其时代特点，既有民族冲突与战争的消极一面，又有民族间友好交往、加速融合的积极性一面。

二

十六国时期民族矛盾尖锐激烈，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现从各国统治阶级间的关系，民族政权汉化和汉人世家士族的作用、“胡汉分治”与各族人民反抗斗争形式以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特点等七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十六国统治者在立国前或登位后，彼此皆有各种联系。后建国的统治者大多来自先朝的官将，势力较弱的国主常受较强的国主封爵，并与东晋互遣使臣，往来不绝。因此，各国统治者之间，时而兵戎相见，剑拔弩张；时而封官授职，联姻结盟，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关于互授封爵方面，史籍记载很多。例如，匈奴刘元海曾受晋封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汉光乡侯”。他称帝后，遣使授羯族石勒为“持节、平东大将军、校尉、都督、王如故”。^①晋愍帝遣使拜辽东鲜卑慕容廆为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前赵刘曜封前凉张茂为“领西域大都护、护氏羌校尉、太师、凉王”。^②后燕慕容垂为前燕慕容皝之子，封吴王，投奔氐秦之后，拜冠军将军，封宾都侯，官至京兆尹。南燕慕容德为慕容垂弟，后燕封他为范阳王。后秦姚苌原为苻坚

^①《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②《晋书》卷103，《刘曜载记》；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

龙骧将军。西秦乞伏国仁曾被前秦封为苑川王，其弟乞伏乾归被封为金城王。后秦姚兴又以乾归为河州刺史。南凉建立者秃发乌孤曾受后凉吕光的官爵，其子秃发傉檀受后秦姚兴之封为车骑大将军、广武公。前赵刘聪封铁弗刘虎（赫连勃勃祖）为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后秦姚兴又拜勃勃为骠骑将军，加奉车都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较弱国并常向较强国朝贡称藩。如前凉张茂向前赵刘曜“遣使称藩，献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头、羊十万口、黄金三百八十斤、银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诸珍宝珠玉、方域美货不可胜纪”。^①南凉秃发傉檀曾向后秦姚兴“献马三千匹，羊三万头”。^②西秦乞伏炽磐遣使朝魏，贡黄金二百斤，请伐夏。^③

十六国的大都统治者与东晋也有不同程度联系，遣使遗书，频见史载。如前燕奠基者慕容廆受东晋元帝封为“车骑将军、并州牧、辽东郡公”^④等。永和七年（351年），东晋拜后秦先人姚弋仲“使持节、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单于，封高陵郡公”。^⑤义熙十二年（416年），西秦乞伏炽磐遣使于晋，受封为河南公。北凉卢水胡沮渠蒙逊执政时，东晋益州刺史朱龄石“遣使来聘”。蒙逊“遣舍人黄迅报聘益州”，并上表“请率河西戎为晋右翼前

①《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②《晋书》卷126，《秃发傉檀载记》；《资治通鉴》卷114，晋安帝义熙二年。

③《魏书》卷99，《乞伏国仁附炽磐传》；《资治通鉴》卷119，晋晋阳王景平元年。

④《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⑤《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

驱”。①十四年（418年），沮渠蒙逊奉表称藩于东晋，拜凉州刺史。东晋刘裕灭后秦，攻取长安后，也遣使遗书大夏国主赫连勃勃，“请通和好，约为兄弟”。②

当然，各国之间的战和向背，是以统治集团的利害关系为转移。因而，往往瞬息之间，风云突变，和使未归，战事又起，刀光剑影，生灵涂炭。这时期各个不同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具有其自身的特点。由于各国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因而使这些政权之间的战争往往带有明显的民族战争性质。它既不同于三国鼎立式的割据战争，更不能等同于外国的侵略战争，而是中国各民族统治者在国家处于分裂时期，争夺中原或其他地区统治权的斗争。

（二）内迁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多是各族统治者与汉族地主的结合，共同压迫剥削汉族及他族人民。

内迁各族的统治者虽然汉化程度较高，但本族文化程度相对要低些，人口也较为稀少。他们在建立政权以后，急切需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加强对文化较高的汉族人民的控制，因而，就必须得到汉族世家豪强的支持和合作。在保存汉人原来的租税制度的同时，少数民族统治者也逐步和汉人世家豪强相结合。这样，内迁各族统治者和汉族世家豪强的关系就显得极为微妙，既有逼迫和损害汉族世家豪强相对抗的一面，又有与他们妥协和联合的一面。对汉人士族实行安抚政策，在政治上拉拢和重用他们，往往承认他们原有的政治、经济特权和社会地位，并授以高官厚禄。而滞留在中原地区的汉族高门华阀和坞堡豪强，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也宁愿投靠各族统治者，以

①《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

②《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确保自身利益和施展临乱致治的才能。这就为两者的结合创造了特定的历史条件，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和汉族世家豪强，便在利害一致的前提下联合起来。

内迁各族的建国大多得到原西晋中下级士族的帮助。这些汉族世家士族在辅佐少数民族统治者立国、建立封建统治秩序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如张宾之于后赵政权，王猛之于前秦政权，尹纬之于后秦政权。

张宾，字孟孙，赵郡中丘世家。“少好学，博涉经史，不为章句，阔达有大节”^①石勒投靠刘渊为“辅汉将军”，与诸将下山东。当时，群雄角逐，张宾认为“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乃提剑谒军门，“大呼请见”。^②石勒命其为“参军都尉，领记室，位次司马，专居中总事。”^③称其为右侯，而不名。史谓“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勳也”。^④故张宾病卒时，石勒流涕顾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⑤其他诸如张班、孟卓、王波、斐宪、卢湛、石琚、傅畅、杜徽、荀绰、崔悦、崔遇、郑略等世家士族也得到石勒的重用。石勒在冀州集衣冠人物为君子营，后又“徙朝臣掾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⑥这一方面固然为了便于控制，另一方面也是尊崇士族的表现。

王猛助苻坚治秦，也是一个显例。王猛，字景略，北海剧人，家于魏郡。“少贫贱，以鬻畚为业……瓌姿儒伟，博学好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⑦深得前秦苻坚的信任，官至丞

①②④《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附张宾传》。

③《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⑤《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附张宾传》。

⑥《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⑦《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相，封清河郡侯。在军事上辅助苻坚统一北方，在政治上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纪纲，惩罚豪强，推崇儒学，平外患息内乱，劝课农桑，与人民休养生息等等，使前秦“兵强国富，垂及升平”。苻坚并“复魏晋士籍”，以争取汉族世家士族的支持，于是“关东士望”如房旷、房默、崔逞、韩胤、阳涉、田颺、阳瑶、郝略等人都纷纷投靠苻坚。淝水之战后，当苻坚与羌族姚氏角逐时，“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翔赵敖为统主，相率结盟，遣兵粮助坚。”①

后秦统治者姚兴也注意重用汉族世家。史称“兴留心政事，苞容广纳，一言之善，咸见礼异。”②他信任顾命大臣尹纬就是突出一例。尹纬，字景亮，天水人，关西豪族。他帮助姚兴制定封建法治，“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若州郡县所不能决者，献之廷尉”。③还“班命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④以解放部分奴婢，增加农业劳动力，并增关津之税以限制和打击豪强地主之势力。

这些汉人世家士族与少数民族统治者联合，固然有共同镇压和剥削各族人民的一面。但他们帮助少数民族统治者在中原地区建立短暂安定的朝代，创立封建统治新秩序，局部地稳定了人民群众生活，使其免受颠沛流离之苦，有利于恢复社会经济和促进民族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还具有一定值得肯定的历史作用。

（三）各族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大多注重学习汉族较为先进的封建文化传统和生产技术，促进本民

①《晋书》卷114，《苻坚载记下》。

②③④《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1、重用汉族世家，制定封建官制礼仪。如匈奴刘渊建元称号，“大定百官”，中央设丞相、太师、太傅、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等七公。后赵石勒“朝会常以天子礼乐飨其群下，威仪冠冕从容可观矣”。^①前燕慕容廆引用大批汉族士人处理政事，大兴礼乐，法制皆学汉人。前秦苻坚任用王猛等，“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在所以闻。”^②俨然以盛世圣君自居。后秦姚苻称帝于长安，改元建号，立皇后、太子，置百官，“自谓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汉氏承周故事”。^③

2、兴办教育，崇尚儒学。各少数民族统治者颇为注意兴办教育，吸收汉族较为先进的封建文化和统治权术。匈奴刘渊、刘聪、刘曜，卢水胡沮渠蒙逊，鲜卑族慕容廆、慕容翰、慕容宝、慕容德，氐族苻坚、苻融，羌族姚苻、姚兴、姚泓等人都有相当高的汉文化修养。尽管十六国时期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这些统治者只要苟获小安，还是设法兴立学校，崇尚儒学，注重文艺教育，有时并通过考试的途径选拔人才。例如：

前赵刘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臣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并亲临太学，“引试学生上第者拜郎中”。^④

①《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②《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③《晋书》卷116，《姚苻载记上》。

④《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后赵石勒本人不识字，但“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言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并“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石勒得襄国后，“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在地方郡国，也设置学校，“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在选举方面，沿用九品中正制，使“其举人得遂相荐引，广招贤之路”。①

前燕慕容廆以“平原刘讚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国胄束脩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②其子慕容皝继位后，“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并“雅好文学，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③南燕慕容德即位之初，下令“建立学官，简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④

前秦苻坚在广兴学校、尊崇儒学方面，于十六国中更为突出。他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劝励，号称多士……典章法物靡不悉备。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后来，苻坚“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并把教育施及将士后宫，

①《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13，《后赵石勒》。

②《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③《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

④《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